

大墙里的白玉兰

□王 娟



春天要来了,看守所院里的白玉兰就要开了。那个以前常穿梭在开花的树下的兄长,却回不来了。

2020年2月13日,河南省三门峡市看守所民警李建生拿了换洗衣服和药准备回所。早上7点临出门前,和妻子结婚32年的他,破天荒地抱着妻子张焕平的脸亲了一口说:“媳妇,我走了!”这个举动,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。谁料,当天晚上,张焕平就接到他进了急诊室的电话。

河南紧靠湖北,是此次疫情的全国次重灾区,抗疫形势从一开始就特别严峻。看守所在押人员密集、人员流动性大,一旦疫情传入监区,治疗、疑似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、监区的安全都会十分麻烦,后果不堪设想。从1月27日,全国公安民警就取消休假,全员返岗投入抗疫战,三门峡市看守所自然也不例外。

李建生所在的看守大队,原本加他有6名民警,但一人患病做了手术不能上岗。李建生连着1月23日、24日(除夕)值了两天两夜班。本打算大年初三去洛阳看望78岁的老母亲,这时候,接到了取消休假的命令,他便放弃探亲,回到了所里。28日、29日,一个同事咳嗽发烧,需要隔离。李建生又替了他两天两夜班。2月1日,全国监所全部实行封闭管理,李建生二话不说又带头人上,从2月1日至6日一直在所值班和封闭备勤。

期间,领导考虑他的身体,怕出事,让他回去休息一下:“你年龄大,身体又不好,不行让其他人上吧?”他却说:“人手紧,没事,我能顶住。”

他回家拿了趟衣服和药,2月13日返岗,那天一整天,李建生不停穿梭在看守所大院、AB门、监区执法服务大厅、提讯区,办理远程视频提审,代替办案单位办理在押人员换押、延期等法律手续。原本面对面办理的简单流程,因疫情防控外人不得进入监区而变得异常烦琐。对讲机里,不时响起李建生协调监区内外办理业务的声音,没有人察觉他的异样。事后,有同事截图了他的微信运动,这一天,他共走了12000多步。

晚上20时20分,全体值班、备勤民警和辅警开始封闭晚点名,李建生从办公桌前起身时,突然无力地说:“我怎么站不起了?”一旁的民警赶紧上前扶住他,大声喊人。此时的李建生已四肢瘫软、神志不清。同事拨打了120,驻所医生也跑来急救。随后,他被送上了救护车。

2月15日16时15分,经过44小时的抢救,医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。没有来得及留下一句话,56岁的他因突发脑溢血匆匆走了。截至他倒下那天,公安机关打响抗击疫情战斗共18天,李建生在一线上工作就达9天。

在他生命的最后10多天里,他还在为疫情特殊时期的监所技术革新操着心。为了解防疫和服务实战办案的难题,李建生和所领导一道开动脑筋,利用驻所封闭的时间,用最短时间在全国全省率先研发出“法律文书送达代办系统”、“远程视频提讯系统”,极大方便了实战单位,为监所守住了防疫最后防线。他对技术人员说:“软件要‘把困难留在里面,把方便带给外面’,这才实用。”

1986年,李建生从洛阳警校毕业分到三门峡。穿上警服的前23年,他从一个普通民警干到所长、科级干部,最好的年华都在5个农村偏远派出所度过。他摸排线索、固定证据、蹲守抓捕、讯问嫌犯、制作笔录、诉讼结案,从青丝染上霜花,从小伙子变成小伙子们的师傅和领导。无论局领导,还是分局老领导、老同事,一提起李建生,都这样评价他:二三十年前的偏僻农村派出所,经常只有三四个民警,装备差,条件苦,但从没听他叫过

苦,说过累,没有提过要人、要钱、要车等问题,更没有开口要过荣誉。

2009年,因身体原因,他卸下所长的担子,到看守所当了普通民警,这一干又是10个年头。大墙里的岗位烦琐忙碌,这10年,李建生管理教育在押人员500人次无事故,办理入所出所人员3000余人次无差错,办理各类法律文书万余份无瑕疵,确保8000人次在押人员诉讼活动未出现任何问题。

因为抗疫,李建生的后事一切从简,但仍有一些群众得知后,不顾再三劝说,戴着口罩非要来送他一程,李建生家只好大敞着门和窗。东风辖区小商店老板万国良哭着说,2004年9月,他患了白血病。春节时,李建生看了媒体的报道后给他送来了1000元钱。万国良多方打听,才知道他叫李建生,是东风所的副所长。

李建生火化前晚,会兴一组75岁腿脚不灵便的老人刘淑亚,由儿子搀扶着,大哭着在夜色中赶来拜祭。她说,1992年,她丈夫患癌症去世,她一个缺亲少友的中年妇女,拖着三个孩子,大的17岁,小的14岁,缺吃少穿,日子都不知道咋过。时任会兴所副所长的李建生得知后,和她们结了帮扶对子。每逢过年过节,都给她们送来米面油等生活用品。过一段就去看她们,给她们留个50、100块钱救急。不仅在精神上多方开导,还资助她们办了个小沙发厂,从此,一家人才慢慢过上了好日子。她说,李所长太实在,他帮我家的事不叫我给人说。我今天来,他媳妇换平才头一次知道。

会兴街的刘振峰爱惹事。2005年,刘振峰因为打架进了派出所。李建生几次三番苦口耐心地教育他,又找人帮刘振峰承包了一个垃圾处理厂,使他走上了正道。刘振峰说,李建生对他,犹如再生父母。

从警30多年,不争名、不争利、不争荣誉,遇有好事总是让着别人。这个老实人虽然在群众和同事中口碑特别好,可事后市局政治部翻他的功劳簿,发现他竟没有一项超过分局等级的荣誉。2004年2月16日当地党报有一篇文章叫《面对5000元贿金》,这是李建生生前仅有的宣传报道。文中记载了他把嫌疑人家属送来的5000元贿金交到分局纪检监察部门退回当事人的事情。

除了李建生,他家四口人还有两口也忙碌在抗疫一线。儿子在自己单位设在湖滨区涧河街道的某小区防疫卡点值守,儿媳是湖滨区车站街道一防疫卡点的负责人。市区施行网格化防疫后,是李建生支持他们第一批报名到一线值守的。

13日早上,儿子开车把他送到单位,又匆匆赶到自己的防疫卡点上岗:“我最遗憾的,就是那天早上在车里没和他多说几句话,哪怕聊点闲话也好……”

李建生去世第二天,他至今还蒙在鼓里的78岁的老母亲,做了老家灵宝人爱吃的黄面鱼,专门拍照发给孙子看,孙子却迟迟不敢回复。“父亲出事前晚,还给奶奶打了电话,说初三没去看她,接下来还要忙好一阵,等疫情结束了就去看她。奶奶还安慰他说,你安心忙你的,忙完再说。”

2月19日,李建生儿子李俊杉代表家人,把亲友和社会各界捐助的31500元救助金捐给了市红十字会,支持抗疫一线。他说:“父亲是因为抗击新冠肺炎走的,我要替他完成他未竟的事业。”

春天就要来了,看守所大墙里的白玉兰就要开了。那个洁白如玉的人,会魂归故地,再来看看花吗?玉兰树有知,花开祭故人。

33年前的常州城里找不到一家鲜花店;33年后的今天,常州满城找不到一家开门的鲜花店。寂静的街巷,触目皆是口罩,白色的口罩,黑色的眼睛……

1987年的春天,我病了。头痛,出现脑积液,住进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,作抗炎治疗。27岁的小伙子,整日躺在病床上是什么滋味?我利用治疗的间隙,偷偷步入当年医院老病房大楼(现存的一幢民国建筑)后的小花园,闻泥土春天的气息,听绿枝拔节的声音。想象着我的学生——数里之外的北郊中学高二两个班的百余位同学,早间书声朗朗,课上凝神专注。语文老师不在的时候,你们如何自习?老师交给你们的作业完成得可好?

躺在病床上的一周,不是挂水就是昏睡。一次抽取骨髓样本之后,我沉睡了不知多长时间。醒来,口渴,侧身去端杯子。这时,七八枝红的、黄的、粉的花枝带着嫩叶,束在一只胖瓶里(当年的水果罐头瓶)。我的眼睛产生了幻觉,这是什么?这是哪里?淡淡的花香,折枝的青涩,安静地在一侧的床头柜上跟我细语。那时,我们都不懂“花语”,也无花的常识。看褐色的细枝,那分明是从树干上硬折下来的,簇拥着,也散乱着。

同室的病友见我醒来,纷纷对我说,五六个小时模样的人中午送来的,他们轻轻地放好,就

疫情一日,年味彻底不再,不管人们愿不愿意,一个前所未有的不走亲、不访友、不聚餐的萧条春节,就这样到来了。终日宅在家中,最渴望的就是好消息,幸而无望中,总算在电视上看到那位80余岁的南方老者,正以他一贯的耿直和果敢,道出疫情会人传人的事实。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,老人那忧思疲倦的双眼,在接受采访时几番被泪水打湿,作为一名年迈的院士,他发红的眼眶叫人心疼。

既然节日只能封闭在家里,我又重读了描述瘟疫的名著《十日谈》和《鼠疫》。薄伽丘在写1348年佛罗伦萨的霍乱大爆发时说:“不知是由于天体星辰的影响,还是因为我们多行不义,以致天主大发雷霆,降罚于世人,瘟疫夺去无数生灵性命……”这段话读起来依旧令人齿寒,看来任何时代的天灾无不勾结着人祸汹涌而至。我少时在乡下生活,七八月夜间的打麦场,简直就是蝙蝠的天堂,数以千百计的蝙蝠展开双翼,擦着大大小小的麦草垛,在夜空中自由飞翔,它们吱吱叫着,尽情捕食蚊蛾之类有害昆虫。大人们总是不忘告诫我们,说千万不要去招惹或伤害它们,为了引起顽劣孩童们的重视,父母们还谎称,如果用小手去抓捕那些蝙蝠,再拿手摸一下自己的眼睛,从此就会双目失明。记忆中,我们小孩掏过麻雀捉过蚂蚱逮过青蛙也淹过耗子,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蝙蝠。表面上看,这个禁忌像一道幼稚的符咒,可也是底层民众敬畏自然的最好例证,连目不识丁的农人尚且知晓敬畏这一物种,奈何新世纪已过去了20载,聪明的我们反而不明白了吧?

阿尔贝·加缪则描述了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小城的那场鼠疫。主人公厄是一名具有担当精神和良知的医生,当他第一次在诊所楼梯口碰见死老鼠,以及接下来诊所看门人因发高烧淋巴结和四肢肿胀直至死亡后,他便敏感地觉察到一场可怕的灾难已经降临,于是,他试图劝说省府有关人员,希望能够尽快对疫情引起重视并采取措施,可那些人均以无知和冷漠对待医生的预判,天真地认为鼠疫已经消失了近20年,眼下很可能只是一种热病,如此一再推诿和观望,终于使这座城市被瘟神牢牢抓住,无奈之下,上峰才决定封城。作者如是写道:“封城最突出的后果之一,是人们突然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,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说了两三句叮咛的话后拥抱道别,满怀着人类愚蠢的信心,以为过几天或至多几个星期肯定又能见面了……”

文学诉诸于世界的灾难故事不胜枚举,譬如《智利地震》《失明症漫记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等,之所以细说上述作品的原因,其一,它们都曾给我无比巨大的阅读震撼;其二,此刻再读之,即便胆怯如我的人,或许亦能从中汲取一些生的勇气和活的智慧。说到生存智慧和勇气,我不能不提及一部外国文艺影片《危楼愚夫》。故事讲述一名叫迪马的水管工管道修理工,因为某夜接到临时维修的电话,于是匆匆入户进行检查。迪马发现事故远非水管爆裂这么简单,随后他先后几次下楼上楼并爬到楼顶上,在仔细巡查了这栋旧筒子楼后,他确定这栋建于几十年前的老居民楼,墙体早有两道自上而下的大裂缝,而且,楼基严重塌陷,整栋楼随时将要倾倒。于是,迪马开始连夜上报有关部门,甚至找到了主管的市领导,不料这些公职人员正在为该女领导庆祝生日,他们彻夜狂欢豪饮无度。迪马位卑言轻,加之各方利益冲突,始终无人愿意搭理他,更没人想去挽救那楼里的几百条底层性命。一意孤行的迪马差一点卷入因上层利益群体博弈而进行的谋杀,就在他仓皇携妻儿准备连夜逃出之时,良知和责任让他重返事故现场,他决定一层一层爬楼,一户一户敲门,只为唤醒那些或沉睡或烂醉如泥的民众尽快撤离离楼……故事的结局寓意之深令人扼腕:当所有人被叫到楼下后,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危楼将要倒塌的事实,这些愤怒而愚昧的居民将好心的迪马一通拳打脚踢之后,又重新上楼睡觉去了。

也许有人说,这是一部电影。没错,它就是一部电影,可它更是一部了不起的寓言。既然是寓言,就可能会映射我们的现实生活,因为真正的艺术家的灵感,无不来自现实世界和世态人心。而活生生的现实也再次告诫我们,《危楼愚夫》的故事还在上演。相信这些天来,没有哪个名字比李文亮更让人揪心,因为他仿佛现实版的迪马,他要做的事大概就是那个维修工要做的。按理说,基于专业性质和分工不同,管道工只管维修差事,至于楼房会不会倒塌,其实与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……那天,我在书房宣纸上沉痛地写下两行字:

平时跟我不远不近,时有问候,相见总是一脸的笑。去往小区大门的路上,我在想着最近一次跟他见面的情景。远远的,我看不见他的身影,与我相仿的高矮与相貌,只是比我小十几岁,也四十好几了。走近了,他还在低头跟我发信息,一头浓发间也有白发滋生了。我俩四目相望,眼神中有太多的语言!不能拥抱,没有握手,在这特殊的时刻,心中涌动的是骇浪惊涛,是连绵无声的远山波峰。

“老师,这是我单位给的30只口罩,给你10只。”他给了我三分之一,余下的给自己、妻儿、父母……

临别,我给他车里强塞进一个红茶礼盒,送他快离开。没多久,他来微信了:“送了25块钱的口罩,拿回来几百块的茶叶。李老师,你这么搞会破产的。”后面带了一个幽默的傻笑表情。

我真想对我亲爱的学生,对我所有真情的朋友,大声说——

这样的“破产”,我心甘情愿。



庚子疫谭

□张学东



青松临古道,
白月满寒山。

事实上,我脑子里想的最多的还是鲁迅。先生曾说,“他走进了无物之阵,但他举起了投枪”;先生说,“路,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,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”;先生还说,“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,是可憎或是可笑,那倒是不暇顾及的”。众所周知,先生毕生最艰巨的任务,便是要唤醒那些沉睡在铁屋中的即将窒息的民众,或终其一生都在苦苦寻找一剂良药以治民愚。

中国古老的生存智慧便有“飓风过岗,伏草惟存”。我已无法验证李先生是否谙晓此理,但我更倾向于他知道的,知道自己是小草,他真的不想做什么英雄,我相信他脑海中在这样的一丝闪念都没有过,他所拥有的是他的善良、坦诚和勇气。

要说今年过年最大的特色,就是大多数人跟自己的亲朋身处不同的两座城市,只能彼此遥祝了。如此,又让我想到那部脍炙人口的《双城记》来,查尔斯·狄更斯在开篇写道“……那是光明的季节,那是黑暗的季节,那是希望的春天,那是绝望的冬天,我们拥有这一切……”

此时此刻,推开南窗通风,空气中有了和暖的泥土复苏的气息,一切都将过去,一切也将过去,这辈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,静静地等待春暖花开,等待起死回生,等待奇迹出现,因为我坚信战胜病魔指日可待。但与此同时,难免又生一些忧虑,假设,仅仅是个假设,有朝一日,人们又遭厄运,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,瘟神选中某一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藏身之地,那时的你我是否记得今日。



鲜花与口罩

□李怀中

出门也在所难免。于是,口罩成了问题。

我想起两个从医的学生,都是呼吸科专家。一个是中医院的门诊部主任,已经出征武汉。我千叮万嘱,临行学生留下四个字“老师珍重”;另一个是一院呼吸科重症室主任,也已“失联”多日。年前她还嘱我去做了一个肺CT,两个结果没有变化,也是留下四个字“老师放心”。现在我不能联系他们,更不能增加他们的负担。口罩预约几次未果,于是将用过的洗洗、晒晒、烘烘,反复复习,对付着用。幸运的是,年后阳光灿烂的日子多起来了。我惦念着当下在抗疫一线的两位学生,也接着许多学生的电话拜年和微信祝福。往

年家里会鲜花成堆,热闹着呢;今年悄无声息,两盆杜鹃和仙客来静静地陪伴着我们俩,长势尚好。儿子远在大洋彼岸,视频问候,那里也流情感行。儿子说纽约几乎没人戴口罩,但也难以买到口罩,问我为什么,原来美国的口罩多是从中国进口,现在哪里还能供应美国呢?咫尺天涯,环球同此凉热啊。

此时宅家,万籁俱寂。近年来,不知为何,总是习惯重读“旧书”,旧书柜中随手拿出的便是加缪和马尔克斯,鼠疫、霍乱、抗争、爱情、孤独、自然、人性,芒果树顶上的鹦鹉,北非奥兰小城的恐慌……尽管是在消磨时间,但占据眼眶、充斥心灵的尽是这些词和想象。

2月3日,上班第一天的日子,天气不错。下午回家,小区门岗已经不放外人进入。几乎在开锁跨进家门的同时,手机微信“咚”的一声响起,时间是14:33。“李老师,你在哪里?”“给你搜点了口罩。”我大为疑惑,这个时候是谁?“一会小区门口见。”我定睛一看——潘振!我未加思索,立马电话他:“我有,不用不用。”“不可能!”回答得那么干脆。

这是一位现在跟我同行的学生,扛着摄影机,拿着话筒,是电视台的一名干将。可是我印象中,他长得白净又安静,看着他成长,从彬彬儒风到虎虎生气,成为一名我们这座城市的记录者。